

城市治堵不能光靠“限”

张森林

广州市从7月1日零时起，对全市中小客车试行总量适度调控管理。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交委主任冼伟雄宣布，在为期一年的试行期内，全市中小客车增量配额为12万辆；配置指标的具体办法和相关程序将于7月底前发布。（7月2日《人民日报》）

近年来，一些城市为治理拥堵，从“限行”到“限牌”，总是把眼睛盯在制定“限”的政策措施上。不可否认，“限”或许在一段时期内有助于防止交通压力过快增长，但从实质上看，这种做法纯属权宜之计，既难以治标，更无法治本，充其量只能算是下下之策。

毫无疑问，一些城市之所以选择“限”，乃是因其简单易行，只要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控制，让一部分人买不

了车、拿不了牌、上不了路即可。不过问题在于，“限”并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非但消除不了购车和用车需求，反而对民众购车和用车权利构成了一种剥夺，实不足取。若想从根本上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关键还是要把工夫下在“疏”上，而不应把“限”视作灵丹妙药。

当然，“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既需要战略眼光，也需要细致安排，对执政者的智慧是一大考验。譬如有人说，城市治堵应优先发展公交，此话固然不假，可一些地方不惜大笔投入，配置了大量公交车之后，却发现拥堵现象仍旧有增无减。实际上，城市治堵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全面的综合的设计。采取任何局部的、单一的“疏”导之策，都难以获得满意的效果。

首先，应把优化城市布局摆在突出位置。一些城市

规划不合理、配套设施不均衡，甚至工作区与生活区严重脱节，民众不得不整天长途奔波，这是造成拥堵的“头号”根源。其二，要完善交通网络，科学分流车辆。其三，要提高管理水平。倘若道路通行缺乏效率，车少也照样会堵。其四，要凸显公交优势。通过市场调节，让民众在比较出行成本和便捷度等因素后，更倾向公交。

纵观纽约、东京等一些大都市，人口和车辆不比国内一些城市少，也未见“限”这“限”那，却鲜有道路拥堵现象，个中原因显然值得我们学习。期待一些城市能够尽快在治堵上统筹谋划、周密考虑，多动点脑筋、多做点细活，别仅仅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遇到拥堵就只想到“限”。否则，今后免不了会“堵”得越来越狠，“限”得越来越多。

街谈巷议

2元钱韭菜需花5000元检测？

遇到有问题的产品，可将样品送至相关部门检测，但面对高额检测费，不少市民选择放弃。以一捆韭菜为例，每一项指标的检测需要100元左右，按照50种指标全部检测来算，一个样品可能就要花费5000元，而购买这捆韭菜只花了2元钱。（6月29日《齐鲁晚报》）

“追回一只鸡，得杀掉一头牛”，人们常用这句话形容维权成本之高。维权成本高体现在多个方面，检测费居高不下是其中之一。一捆韭菜才2元钱，检测费居然高达5000元，这就在客观上吓阻消费者维权。消费者无奈放弃维权，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因为自身权益无法捍卫，而那些可能存在问题的厂家、商家则会躲过一劫，偷着乐。

这些年，虚高的检测费，让消费者啧有烦言。更令人悲哀的是，有时舍得血本进行了检测，食品或产品被检测出了问题，也不意味着就能维权成功。一个案例是，济南吴先生怀疑买到的火腿有问题，送去检验，一共检了8项指标，花了1600元检测费。高额检测费虽然换回了一个“所检样品实物质量检验项目不符

合标准要求，产品不合格”的结论，但是，“人家这种火腿该卖还是卖，最后我花1600元买了个‘以后不买了’。”

当然，许多时候要维权，检测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不能让高检测费成为消费者维权的拦路虎。不妨从三方面化解。首先，应大幅度降低检测费。不少检测部门一方面享受着财政拨款，另一方面却以高额检测费谋利，这显然不合理；其次，推行公益检测制度；最后，由被检测食品或产品企业埋单。此外，还不妨从改进检测技术入手。据报道，目前发达国家实施的检测方法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不仅灵敏度高、检测时间快——几分钟就检测出来，而传统技术需要几天，更重要的是检测成本低——测10~30项指标才50元。

从改变检测费入手，破除“追回一只鸡，得杀掉一头牛”的维权困局，让消费者轻松、快速、有尊严维权，并能依法维权成功，消费者才有尊严可言。

王石川

彩票发行应回归公益透明

6月，北京男子中5.7亿元彩票，再次掀起彩票信息不透明的质疑。政府被指以保护中奖者隐私为由牺牲公众知情权。（6月30日东方网）

彩民买一张彩票，中奖竟高达5.7亿元之巨，等到媒体和公众追问何人中奖，并对中奖事件表示质疑时，彩票中心却高挂“免战牌”，声称按照相关规定，以对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予以保密为由，拒绝作出任何方式的回应。

其实，彩票中心的依据无非是《彩票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各级销售机构（包括零售商）对中奖者的个人信息负有保密责任，未经中奖者本人同意，不得对外公开中奖者的个人资料。”但这条规定于法不合，因为发行彩票既然是公开的政府行为，彩票发行过程中形成的信息，就应该属于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范畴。也就是说，《彩票管理条例》作为行业条例，

各项条例的制定应当让位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其中涉及保护中奖者隐私规定无异于“霸王条款”，理应得到修正。从这个角度说，中奖信息、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等都应当及时面向社会公开，而不能以隐私为由拒绝透露。

彩票业必须由政府授权有关部门发行，因为彩票一旦由民间发行，必将引发各种矛盾，由政府统一管理，能使彩票业得到有序发展。不过，彩票发行的信息公开透明却不能无。这一点不妨学学国外做法，比如美国许多州彩票管理机构都会根据信息公开法，要求获奖者公开信息；加拿大的许多彩票机构明确规定，中奖者领奖必须要公开身份，否则不能领奖。事实上，许多国外彩票中奖者公开信息后并未对个人隐私带来负面效应，公开彩票信息的行为反而能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从而助推彩票业的健康发展。

林 萧

画里话外



日前，深圳罗湖区公布了市容环境综合考核实施方案。流浪乞讨、露宿人员出现在主干道（严管路），次干道（重要路段）和其他城市道路（控制路段），将分别给予一定数量的扣分。（7月2日《南方日报》）

“乞丐现街头城管将被扣分”一旦生效，执法人员自然就有了很大的内驱力去禁止乞讨甚至大规模驱逐流浪乞讨人员——不管是从服从城市主政者的号令出发，还是从自己的前途命运出发，执法人员都需要通过对乞丐的约束去体现自身作为。

但正如一知名评论人士所言，中国是一辆在城市化道路上奔跑的巴士，你不能保证所有上车的人都是衣冠楚楚的绅士。城市管理者应慎防城市洁癖思维，应该给予底层人群更多的善意，应该能有听任乞丐和拾荒者穿堂而过的雅量。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群的特殊关照，更是城市发展、社会进步的必须。

邓子庆/文 朱慧卿/绘

快言短评

公厕应成银行的“标准配备”

深圳一男子在银行办业务时，突然内急想上银行内厕所，保安以拒绝开放为由，双方起冲突，男子被当众狠踹。事后银行为安抚男子情绪，补偿了1000元购物卡和一套第五套人民币纪念钞，男子深感受辱，希望补偿两万元。（7月1日《南方都市报》）

短评：现在绝大多数银行的厕所，都建在“安全线”以内，只供银行内部员工使用，结果就是顾客憋得脸红脖子粗，银行的厕所也在那闲置着，但顾客就是用不了。面对这样的矛盾和悖论，当银行总在强调这是出于资金安全考虑，无法对外开放厕所的时候，是否想过换一种考虑问题的思路？那就是把银行的厕所设在“安全线”以外，这样一来，既能满足内部员工的需要，也能满足顾客的需要，同时还不妨碍银行的安保工作，不影响银行的资金安全。

换言之，现在银行的厕所，都是只供自己使用的“私厕”，而这么一整改，就变成了既可以自己使用，又可以供顾客使用的真正的“公厕”，利人而不害己，何乐而不为呢？最重要的是，这仅仅只是一个银行建筑内部设计的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实现起来丝毫不存在困难，最多就是增加一些厕所维护和打扫的成本而已。但是这么一来，不但避免了像深圳市这位顾客一样，因为上厕所的问题和银行发生冲突与纠纷，而且还能因为人性化之举，给自己在顾客心目中加上很有分量的一份。

苑广阔

来稿请寄：宁波晚报总编室
邮箱：nbwbpinglun@163.com nbwbpl@126.com

“工伤保险先行支付”莫成一纸空文

去年7月1日生效实施的《社会保险法》确立了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制度。日前，公益组织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调研报告显示，大多数城市对该制度宣传不足、尚未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工伤人员申请先行支付制度渠道不通畅，新政实施1年9成人不知。（7月1日《新京报》）

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有45.1%的劳动者在工伤后无法再工作，76.4%的劳动者在工伤后月收入下降到1000元以下，而工伤待遇索赔由于用人单位的拖延和法律程序的繁琐，仅有26.1%的工伤职工在受伤之日起一年内获得赔偿，21.7%的劳动者维权花费了3年以上，为获得赔偿和等待的平均时间为2.02年。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本意是让劳动者权益能尽快落到实处，确保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但法律出台已一年，九成劳动者却根本不知道这

个制度。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只有9.8%的城市接受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申请，绝大多数城市明确表示“不可以接受先行支付申请”。这说明，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制度在多数地方几成为一纸空文。

之前有人讨论过“先行支付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制度缺憾，现在看来，讨论制度上缺憾显得过于矫情了。如果多数地方都对实施这个制度不热心，制度设计得再完善，再无懈可击，仍会成为“花瓶”。

如果心里想着劳动者的利益，一项制度总会想办法落实，即使制度设计得不完善，也会积极推进。人社部门不但有落实《社会保险法》等相关法律实施的义务，还有宣传相关法律的义务，如果制度设计出来就被“藏之名山”，不去实施也无人过问，在这种不作为的态度下，也就难怪很多劳动者的权益会被侵害了。

瞿方业